

# 2016-2017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

洪紹洋\*

## 摘 要

本文先就 2016-2017 年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依據議題的相似性進行簡要分類，並挑選部分進行介紹。其次，以日本經濟史長期的研究累積為例，經由馬克思經濟學與數量經濟史兩種研究流派的發展經驗，提出臺灣經濟史研究可供借鏡之處。復次，將針對戰後經濟史的論爭可能存在的癥結點提供說明，也檢討戰後經濟史研究應具備的歷史認識基礎。最後，將從作者的研究經驗出發，對數位化檔案、資料庫和統計數字運用時存在的盲點進行考察，並簡要對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經濟史的方法與可能之侷限進行討論。

**關鍵詞：**臺灣經濟史、日本經濟史、歷史認識、歷史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

---

\*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9 年 3 月 7 日；通過刊登：2019 年 6 月 4 日。

- 一、前言
  - 二、研究討論
  - 三、經濟史研究者的自我檢討：歷史認識、資料認識與新視點
  - 四、代結論：回顧與展望
- 

## 一、前言

2016年經濟史類別的研究共有50篇成果，2017年則有92篇成果。受限於筆者的知識與能力，無法逐一對每篇論文進行介紹與評論，僅挑選部分進行說明。

從2007年林玉茹開始撰寫經濟史回顧論文，至2017年李力庸與林文凱兩位先進在近年的回顧與展望會議就經濟體系的農業和工業兩大部門進行精彩的評析與討論，會議論文並已正式發表於期刊中。<sup>1</sup> 本文在行文安排，先對2016-2017年的研究成果依據議題的相似性進行簡要的分類與介紹，<sup>2</sup> 接著再從筆者的研究經驗出發，簡要的對不同學門研究經濟史的方法重新檢視，提出不成熟之淺見。

## 二、研究討論

### （一）農林漁牧部門

近二十餘年在臺灣經濟史中對農業部門的認識，最初以糖業部門的農業與工業連鎖關係為起點，爾後有對米糖相剋的論述。此外，尚有以農業栽培體系為中

---

<sup>1</sup> 林玉茹，〈2007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臺北）28:4（2009年11月），頁19-31；林文凱，〈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南投）68:4（2017年12月），頁117-146；李力庸，〈深耕臺灣：2013-2015年農業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36:4（2017年11月），頁1-13。

<sup>2</sup> 關於碩士論文，因撰述篇幅過大，故本回顧未納入討論範疇。

心的研究論文。近期的研究成果，有就單獨作物的長期發展進行討論、如何因應農業發展過程中的蟲害，還有就農業體系中農政發展進行考察。

黃仁姿的博士論文〈戰時戰後的臺灣農政〉，最大貢獻在於學界對 1940 年代後半的轉換期，以往的討論多侷限於案例研究，其嘗試從整個體系的角度出發討論。作者從碩士論文以戰前、戰後臺灣的農會組織與人事研究的制度史為起點，博士論文階段始從較為寬廣的視野理解農業政策的立案與生產。這本博士論文的貢獻，使得學界對戰時與戰後的認識，能夠從過往以事業單位點的認識，進一步擴展到體系性線與面的認知。<sup>3</sup>

而蔡昇璋的博士論文〈興策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從帝國的框架來看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的發展。作者從帝國水產業的改良轉型與政策調整，漁業制度等各項整備建立的基礎，考察殖民地臺灣水產業的肆應，從中發現漁業制度法規的建立及水產改良、行政確立、獎勵措施等，為臺灣與帝國水產業接軌的重要指標。此外，作者也就漁業發展的過程進行階段性的探討。<sup>4</sup>

張家綸的博士論文〈植樹之道：日治時期臺灣樟樹造林事業及其學術研究〉，從制度史與官僚的脈絡考察臺灣樟樹事業的發展，並探究殖產局所扮演的角色。張氏也對造林事業者進行介紹，且就樟樹的學術研究進行討論。<sup>5</sup>

張孟秋的博士論文〈戰後臺灣中部地區的農業發展（1950-2010）〉，以實證性的觀點，從農業復原期（1945-1953）、農業成長期（1954-1968）、農工並重發展期（1969-1981）、農業結構調整期（1982-1991）、三生農業並重期（1992-2010）等五個階段，考察中部地區農業發展受到國家政策、國際局勢與市場的影響。作者從國家整體農業發展的趨勢，考察其如何帶動中部區域農業之走向。<sup>6</sup>

蔡承豪所著〈品種轉換、加工換轉：臺南的蕃茄產業（17 世紀-1945 年）〉，以長時間的面向考察二次大戰前臺南番茄產業的樣貌與演進。結果發現，臺灣的番茄從移出到日本國內為起點，進而輸出到國外。而在伴隨向外出口的過程中，1930 年

<sup>3</sup> 黃仁姿，〈戰時戰後的臺灣農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

<sup>4</sup> 蔡昇璋，〈興策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sup>5</sup> 張家綸，〈植樹之道：日治時期臺灣樟樹造林事業及其學術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7）。

<sup>6</sup> 張孟秋，〈戰後臺灣中部地區的農業發展（1950-201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7）。

代起臺南始陸續設置番茄加工廠，將其製造成罐頭，銷售至歐美和日圓經濟圈。<sup>7</sup>

呂紹理所著〈從螟蛉到螟害：近代臺灣的農業蟲害及其防治〉，考察近代臺灣的農業生產面臨哪些昆蟲危害，以及殖民地政府與農民如何理解和回應這些蟲害。作者指出，在殖民地臺灣與日本之間，蟲害的研究與防治方法出現互相抄襲、競爭與制約的關係，並進一步分析臺灣與日本國內間處理蟲害實踐內容的相同與相異之處。<sup>8</sup>

## （二）企業經營與產業發展

在企業經營和產業發展的過程中，若能有新資料出現，將有助於對既有課題重新檢討，或是開展新的研究議題。臺灣歷史的五大家族中，多為資產龐大的家族，透過未公開資料的解讀與出版，能夠使學界重新理解經濟史中資本的積累過程。此外，產業發展中受到矚目的多為近代化的大工業部門，透過小規模地方行號的考察，可釐清這些地域性經營的小型行業，如何透過對外來技術的吸取與學習，使得商品需求以舊式生產或仰賴進口的樣式，邁向本地自行生產之階段。經由這樣的研究過程，有助於對臺灣資本主義之形成進行更為深刻的認識與討論。

莊勝全的博士論文〈《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以社會史研究的取徑來討論《臺灣民報》的經辦。作者考察報社組織架構、人事布局、新聞採訪、報導撰寫、編輯流程、呈繳檢閱與銷售流通等諸般環節的歷史景況，並以黃旺成為例說明加入民報社的重層機緣與條件，及逐步鑲嵌進社內的科層組織中，其職位與薪俸逐步攀升的進程，還有各項事務活動的參與。最後，以「報社經營」、「文本特性」及「媒體環境」三個層面為總結，具體闡釋其歷史意義。<sup>9</sup>

黃富三所著〈林朝棟與清季臺灣樟腦業之復興〉，運用「霧峰林家文書」重新論述林朝棟在開山撫番期與公泰洋行合作的背景、樟腦自由買賣時期雙方合作之

<sup>7</sup> 蔡承豪，〈品種轉換、加工換轉：臺南的蕃茄產業（17世紀-1945年）〉，收於林玉茹、植野弘子、陳恒安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IV：社會與生活》（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頁137-163。

<sup>8</sup> 呂紹理，〈從螟蛉到螟害：近代臺灣的農業蟲害及其防治〉，收於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403-462。

<sup>9</sup> 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始末、自營產銷、對清季臺灣樟腦業的貢獻。在這批文書中存有大量樟腦相關資料，以往認為林朝棟和公泰洋行的合作產銷為參與樟腦業之契機，透過新史料的發現能夠釐清既有論述不精確之處。從該文能夠瞭解霧峰林家如何運用軍功取得原料，並在國際需求的契機下與洋行合作，再進一步設立商號之過程。<sup>10</sup>

高淑媛所著〈線香與生活：臺灣傳統線香業及其技術的演變〉，考察香舖臺南曾振明號和鹿港施錦玉號如何從中國大陸移轉到臺灣開業。此外也從產業面說明如何培育出技術人材，出現技術擴散的現象，與經由生產量的增加取代既有進口成品的過程。<sup>11</sup>

陳家豪所著〈從產業合理化與交通統制看臺人資本存續：以汽車運輸業為中心（1929-1945）〉，經由史料的耙梳說明 1930 年代臺灣汽車運輸業的整併，係以解決眾多資本的過度競爭，以提升營業效率，而非過往論述所強調的以日本資本取代臺灣人資本的民族性考量。<sup>12</sup>

### （三）銀行與金融部門

銀行金融史研究，堪稱經濟史研究門檻較高的子領域。除了要以瞭解銀行營運科目內容為前提外，還要具備報表數字的解讀能力。不僅要對金融單位的內部進行瞭解與研究，也需要透過銀行外部的存放款單位，掌握整體的經濟環境。在研究面向中，一者為針對銀行體系的內部營運進行經營史的討論；二者是以金融單位出發，針對產業金融與人民的資金貸放等關係進行討論，考察各階段的社會經濟脈動。

臺灣銀行所編纂的《臺灣銀行七十年》，性質上屬於公營事業常以十年出版一冊的公司史書籍，提供銀行營運的資料供讀者參考。<sup>13</sup> 從史料的價值來看，戰後公營事業和民間企業所出的公司史，能夠讓讀者對該事業單位的重要事蹟有所瞭解，但每期編輯的水準隨主事者要求而有所不同。

<sup>10</sup> 黃富三，〈林朝棟與清季臺灣樟腦業之復興〉，《臺灣史研究》（臺北）23:2（2016年6月），頁1-64。

<sup>11</sup> 高淑媛，〈線香與生活：臺灣傳統線香業及其技術的演變〉，收於林玉茹、植野弘子、陳恒安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V：社會與生活》，頁165-180。

<sup>12</sup> 陳家豪，〈從產業合理化與交通統制看臺人資本存續：以汽車運輸業為中心（1929-1945）〉，《臺灣史研究》24:1（2017年3月），頁77-124。

<sup>13</sup>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七十年》（臺北：該行，2016）。

近十餘年來，張怡敏以戰前營業報告書為中心，針對各個銀行的股東構成和財務經營等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李為楨則是致力對戰前信用組合團體的營運進行考察，理解地方的資本積累型態。在 2016-2017 年中，這兩位研究者也針對銀行史發表 3 篇研究論文。以往在經濟史中出現以農業和工業等產業史的研究居多。然而，就產業發展的過程來看，從產業金融議題進行研究，才能對資本積累的脈絡更加掌握。經濟史中的產業研究，若能與銀行史相連結，有助於對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產業脈動進行連鎖性的觀察。

張怡敏所著〈臺灣貯蓄銀行之設立及其發展（1899-1912 年）：兼論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以第一家總行設在臺灣的民間銀行——臺灣貯蓄銀行為例，探討臺灣人的資本動向，還與同時期臺灣銀行的業務成長進行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新銀行的興起與競爭，臺灣貯蓄銀行的重要經營者與出資者在 1910 年設立臺灣商工銀行，最終在 1912 年前者將後者併入，成為臺灣史首宗的銀行合併。<sup>14</sup>

張怡敏另一篇〈臺灣銀行股東構成之特徵與其意義（1899-1919）〉，從 1899-1919 年臺灣銀行的股權資料中，分析殖民地銀行歷年股東構成與變遷，耙梳國家意志表現的可能。結果發現，臺灣在地資本約僅佔 10%，且多為在臺日資所持有，臺灣人股東持股數僅約佔 2-3%。然而，臺灣銀行歷經開業 20 年後，臺灣人持有股份則上升至 7%，股東人數也呈現增加趨勢。其次，這項研究又發現隨著時間變遷，股權的集中度可說漸行分散，顯現出股票交易流動之現象。<sup>15</sup>

李為楨所著〈日治初期臺灣銀行對地方之經營：以鼎新公司為例〉，以鼎新公司進行個案討論，考察這些日治時期小型金融公司的營運。這項研究有別於張怡敏著重於銀行資本的營運，而是從臺灣銀行為推廣銀行業務與貨幣的過程中，與地方仕紳兩相合作為論述焦點。以往對日治時期地方金融事業的理解多從信用組合出發，透過本研究的成果，提供讀者新的瞭解，知悉在信用組合普遍成立前，地方資本如何在銀行體系欲深植地方的過程中延續自己的勢力與找尋本身所存在的利基。<sup>16</sup>

<sup>14</sup> 張怡敏，〈臺灣貯蓄銀行之設立及其發展（1899-1912 年）：兼論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臺灣史研究》23: 1（2016 年 3 月），頁 39-74。

<sup>15</sup> 張怡敏，〈臺灣銀行股東構成之特徵與其意義（1899-1919）〉，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7），頁 483-505。

<sup>16</sup> 李為楨，〈日治初期臺灣銀行對地方之經營：以鼎新公司為例〉，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07-524。

連克所著《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營（1862-1947）》，先說明臺灣商人一方面與洋行合作，除擔任洋行買辦外，並在辦理洋行進出口貨物的過程中參與損害保險的經營；此外，臺灣商人還以本身商號擔任華資保險公司的代理店。接著，再就日治時期臺灣人以「日臺合資」的方式設立保險會社，並以 1900 年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和 1920 年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為例考察。<sup>17</sup>

#### （四）流通部門

考察資本主義發達的歷史，工商業的發達有賴流通體系的建立。在臺灣經濟史中，內部構造的市場統整除仰賴交通體系的建立外，尚與流通部門的整備有關，才能建立島內統一的市場。對外關係則是以港灣等交通設施的興築為起點，接著則是建立定期航線與建立載運系統等。

陳穎禎、青井哲人所著〈清末から日本植民地時期までの台湾阿里山地域における蕃産品交易所に関する研究：交換事業者劉闊の活動を中心に〉，討論從清末進入日治，殖民地政府如何在漢人與原住民衝突的背景下，將原本兩條各族群所屬的流通體系整合為一。<sup>18</sup>

王御風所著《波瀾壯闊：臺灣貨櫃運輸史》，對中國航運、長榮海運、陽明海運、萬海航運，還有高雄港和基隆港為主軸，以通俗的手法記錄企業與港口使用貨櫃運輸所帶來的改變。<sup>19</sup>

李衣雲所著〈戰時から戦時まで：国家統制と台湾の「百貨店」、1937-1960〉，延續 2010 年 5 月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3 期所著之〈日治時期日本百貨公司在臺灣的發展：以出張販賣為中心〉專文，<sup>20</sup> 由更為豐富的資料與考察時間的向後延續，使學界能夠對戰後百貨公司有所認識。此文從消費文化的角度探討戰前、戰後出現在臺灣的百貨公司，且針對戰時物資管制之對奢侈品加以限制

<sup>17</sup> 連克，《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營（1862-194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7）。

<sup>18</sup> 陳穎禎、青井哲人，〈清末から日本植民地時期までの台湾阿里山地域における蕃産品交易所に関する研究：交換事業者劉闊の活動を中心に〉，《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東京）81: 722（2016 年 4 月），頁 1059-1067。

<sup>19</sup> 王御風，《波瀾壯闊：臺灣貨櫃運輸史》（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sup>20</sup> 李衣雲，〈日治時期日本百貨公司在臺灣的發展：以出張販賣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33（2010 年 5 月），頁 155-200。

的背景下探討百貨公司經營型態的調整。<sup>21</sup>

## （五）人物研究

在經濟史研究中除了對各個產業與經濟單位進行研究外，尚須就人物進行考察，才能體現出歷史研究的血肉與情感。透過官僚、資本家的考察，將有助瞭解政策立案、創業背景與經營決策等。但在人物研究中，若能取得私人文書進行解讀，並參照已公開文書的使用與掌握同時期整體的經濟構造，將有可能提出新的研究論點。

釋明瑛所著〈被遺忘的豪商郭春秧：以日治時期活動為主題〉，透過原始資料和口述訪談的方式，重新建構晚清到日治茶商郭春秧的經濟活動與晚期發展。這篇論文的貢獻在於彌補了晚清至日治時期臺灣茶業發展下對商人角色的認識，更是臺灣經濟史中人物研究的重要成果。<sup>22</sup>

陳祥雲所著〈劉航琛與利濟實業公司的經營（1946-1956）〉，介紹劉氏在中國大陸以1926年起投資民生實業公司為起點與相關事業經營。接著再討論1949年其來臺後臺灣利濟公司的營運因喪失中國大陸時期的政商人脈，營運上十分艱辛，但仍嘗試創辦臺灣雲母礦業公司和祥泰鋼鐵公司。<sup>23</sup> 這篇文章是從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討論為起點，進而延伸到中國大陸的資本家撤退來臺後經濟活動的事例研究。

## （六）地域經濟史

在經濟史的討論中，除了關注整體、大範疇的部門與體系問題外，各地域存在不同的消費、交易與地區性產業的發展樣式，為相當重要的議題。在2016、2017年分別有9篇、5篇是以縣市和鄉鎮的商業活動或產業經營等作為考察。這些地域經濟史的研究論文，為瞭解臺灣資本主義發展中底層資本積累的重要研究成果。

---

<sup>21</sup> 李衣雲著、齊藤啓介譯，〈戰時から戦時まで：国家統制と台湾の「百貨店」、1937-1960〉，收於細川周平、山田獎治、佐野真由子編，《新領域・次世代の日本研究》（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6），頁87-111。

<sup>22</sup> 釋明瑛，〈被遺忘的豪商郭春秧：以日治時期活動為主題〉，《臺灣學研究》（新北）20（2016年12月），頁31-68。

<sup>23</sup> 陳祥雲，〈劉航琛與利濟實業公司的經營（1946-1956）〉，《國史館館刊》（臺北）49（2016年9月），頁33-64。



李文良所著〈清代南臺灣六堆的米穀生產與流通〉，運用臺灣本地、廣東、香港等地的文獻，估算六堆的米穀生產、消費和流通，以瞭解清代臺灣南部客家的社，除提出臺灣島內外米穀流通與消費等各項問題外，並進行清代臺灣南部客家社會之考察。研究發現，「雙冬早稻」的核心意涵在於提早收成，能有效彌補人口密集都會區的米糧需求和作為外部貿易流通的商品，非提供在地人食用。作者強調，「雙冬早稻」並非與熟番的特殊文化相連，而是與外部因素的經濟收益有關。<sup>24</sup>

值得注意的是，各縣市政府文化局所編輯的期刊，尚透過特稿邀約或由在地大學教授、地方文史工作者自發性的研究，有助於提供對不同地域經濟史新的認識。例如 2016 年 3 月創刊成立的《桃園文獻》，是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李力庸教授擔任主編，募集年輕學者的研究論文，重新以嚴謹的角度理解在地歷史的發展。

李力庸所撰〈從大圳到水庫：石門水庫興建與土地利用〉，這篇論文的重要性在說明石門水庫的興建，是為了彌補桃園大圳水源供應的不足，並就水庫興築時網羅地方菁英和中央人材進行的組織動員加以說明。石門水庫最初是為了農業灌溉用水與防洪功能，縱使水庫興建後農地並未如同預期的增加，仍因工業部門的興起與人口的增加，成為當地重要的供應水源。石門水庫為戰後政府第一個重要大型的公共工程計畫，當時可說網羅各路人馬進行興辦，並獲得美援的支持。<sup>25</sup>

莊濠賓所著〈萬里雲羅：桃園紡織一甲子〉，對戰後桃園地區的紡織業興起、發展和轉型進行簡要考察，此外，還說明伴隨當地紡織業的興起，在地並設立紡織相關的技職教育單位，培育所需人材。這篇論文指出紡織業因國際競爭力衰退，雖在紡織本業虧損，但因擁有大量閒置土地，轉向開發土地或建設工商中心。作者還以龜山工業區為例，說明當紡織業關廠後，電子高科技業進入該區取代既有產業活動。<sup>26</sup>

莊建華所著〈回首來時路：桃園國際機場的規劃與興建（1969-1979）〉，從臺灣民航發展的沿革脈絡，來看桃園國際機場的建立過程，並詳細耙梳機場位址的選擇，乃至土地的購入與安遷在地原有居民。當中的討論有別於以往對機場的討論，不侷限於乘客和班機次數的認識，而能進一步檢討區位與周邊環境。<sup>27</sup>

<sup>24</sup>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六堆的米穀生產與流通〉，《臺灣史研究》23:4（2016年12月），頁39-80。

<sup>25</sup> 李力庸，〈從大圳到水庫：石門水庫興建與土地利用〉，《桃園文獻》（桃園）1（2016年3月），頁79-86。

<sup>26</sup> 莊濠賓，〈萬里雲羅：桃園紡織一甲子〉，《桃園文獻》1，頁87-98。

<sup>27</sup> 莊建華，〈回首來時路：桃園國際機場的規劃與興建（1969-1979）〉，《桃園文獻》1，頁99-107。

## (七) 土地問題與資本積累

近年來在臺灣學界，對於戰前土地調查、戰後臺灣土地改革的研究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林文凱所著〈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提出劉銘傳以清代傳統的家產式官僚的行政體制來執行清賦事業，後藤新平以近代科層官僚的行政體制執行土地調查。兩者所採取的機制設計在監督上存在嚴謹性差異，前者並無法帶動土地行政體制的變革，後者卻造就土地所有權的保障與土地法律近代化的實現。兩個時期政策行動出現不同的結果，可歸因於官僚體制的性質差異。<sup>28</sup>

吳密察所著〈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8-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說明臺灣土地調查可以順利完成，係充分運用日本國內「地租改正」的經驗，還有劉銘傳推動「清賦」基礎，並以寬鬆的標準認定臺灣人的土地權利主張，故臺灣人當下並未明顯認為本身的土地權利受到侵犯。<sup>29</sup>

張安琪的博士論文〈臺灣寺廟土地財產的近代化（1895-1910）〉，探討 1898 年臺灣總督府透過土地調查事業的展開，在逐一清點土地的權利關係下，前清時期地方公共事業所形成的公共團體財產也面臨權利化之問題。作者以「寺廟土地財產」為主體，探討此類地方公共財產近代化的兩個層次。這篇學位論文的貢獻，超越以往對於日治初期土地調查僅著重官僚和土地所有權的認識，進一步論述寺廟土地單位的土地財產如何受到制度變革所帶來的影響。<sup>30</sup>

至於戰後的土地改革研究，從早期徐世榮、蕭新煌在 2001 年所著〈臺灣土地改革再審視：一個「內因說」的嘗試〉，之後徐世榮陸續撰寫一系列之研究論文與書籍。<sup>31</sup> 劉志偉、柯志明在 2002 年所著〈戰後糧政體制的建立與土地制度轉型過

---

<sup>28</sup> 林文凱，〈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臺灣史研究》24:4（2017年12月），頁35-76。

<sup>29</sup> 吳密察，〈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8-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10（2017年12月），頁5-35。

<sup>30</sup> 張安琪，〈臺灣寺廟土地財產的近代化（1895-191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sup>31</sup> 徐世榮、蕭新煌，〈臺灣土地改革再審視：一個「內因說」的嘗試〉，《臺灣史研究》8:1（2001年10月），頁89-124。

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有別於過往集中在國家角色，而是從國家、地主與農民三個社會行動者的互動關係出發，對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政策出現的脈絡進行的動態性討論。<sup>32</sup> 2011年陳兆勇的博士論文〈土地改革與政權鞏固：戰後臺灣土地政策變革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亦是由國家、地主與農民三個集體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來考察戰後初期臺灣的土地改革；研究結果發現，政府為權力最大的行動者，並將土地改革作為工具，解決戰後初期所面對的統治難題。<sup>33</sup>

此外，瞿宛文等於2015年3月在《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8期中，所著三篇一系列的研究論文特刊〈臺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歷史過程〉、〈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從土地所有制度演進重看臺灣戰後初期農村土地改革〉，提出對土地改革的見解。<sup>34</sup> 在與本次考察期無關的2018年，有莊濠賓的博士論文〈世變下臺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由下而上觀察土地改革對地主的經濟活動帶來的影響，以細膩的研究技法進行實證性的考察。<sup>35</sup>

關於土地改革的政策立案到實施成果，可從國家、大小地主、農民和資本家等層面切入。透過新資料的公開、耙梳與解讀，即有不同論點的研究成果出現。這樣的研究成果，並在學術與非學術界出現各種型態的討論與對話。在2016年的經濟史研究成果中，又陸續有3篇土地改革相關論文。

薛化元所著〈國民黨經濟政策與臺灣經濟發展的再思考：從土地改革講起〉，針對戰後國民黨一黨獨大脈絡下推動的土地改革進行分析。研究首先指出日治末期實施的經濟統制對土地改革的影響，還須瞭解政府在推動土地改革時所獲得的

<sup>32</sup> 劉志偉、柯志明，〈戰後糧政體制的建立與土地制度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臺灣史研究》9:1(2002年6月)，頁107-180。

<sup>33</sup> 陳兆勇，〈土地改革與政權鞏固：戰後臺灣土地政策變革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2011)。

<sup>34</sup> 瞿宛文，〈臺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98(2015年3月)，頁11-67；廖彥豪、瞿宛文，〈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歷史過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8，頁69-145；何欣潔，〈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從土地所有制度演進重看臺灣戰後初期農村土地改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8，頁147-193。

<sup>35</sup> 莊濠賓，〈世變下臺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經濟利益。除此之外，還強調針對戰後臺灣經濟進行討論時，應注意到當時統治構造中的「政治外省人、經濟臺灣人」模式。<sup>36</sup>

何鳳嬌所著〈臺灣實驗經濟農場的成立與裁撤（1947-1951）〉，說明戰後初期政府運用日本人留下的公、私有土地，在花蓮、高雄、臺中設置實驗農場，建立「從產製到運輸，自生產至生活」的農業經營模式。但歷經三年多失敗後裁撤，且配合公地放領政策，由原先承租的農戶承領，成為耕者有其田的先驅。但地方政府與農政單位似乎處於相異之立場，說明公地放領政策的內在拉扯。<sup>37</sup>

洪紹洋所著〈臺灣工礦公司之民營化：以分廠出售為主的討論〉，關注省營臺灣工礦公司如何在土地改革制度下實施分廠出售民營化，以及民營化政策對民間資本積累與地主資本的影響。該公司採行分廠出售的民營化方式，促成民間資本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廠房，免除創廠初期的前置作業。若從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的延續性而論，部分於戰時興起的新興工業，戰後併入公司受限於資金與資源而停滯，部分在分廠出售後成為臺灣較具規模的企業。<sup>38</sup>

## （八）從考古調查看早期的經濟活動

臺灣早期的歷史研究中，在欠缺文字的記載下，僅能透過考古現場的還原與分析，瞭解過去的經濟活動。

李匡悌所著〈成本與抉擇：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聚落生活的經濟學觀察〉，提出早期因為缺乏文字記載，對於新石器時代，僅能透過考古的復原進行考察，瞭解其生活的資源基礎與使用物資。這篇文章，從考古遺址的地理位置、出土器物、生態和遺留現象，從成本和抉擇的原則，以近期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大坌坑文化的社群，依據當時聚落選擇居住場所和選取自然生活資源模式進行分析。<sup>39</sup>

---

<sup>36</sup> 薛化元，〈國民黨經濟政策與臺灣經濟發展的再思考：從土地改革講起〉，《臺灣風物》（臺北）66:1（2016年3月），頁73-101。

<sup>37</sup> 何鳳嬌，〈臺灣實驗經濟農場的成立與裁撤（1947-1951）〉，《臺灣風物》66:4（2016年12月），頁45-92。

<sup>38</sup> 洪紹洋，〈臺灣工礦公司之民營化：以分廠出售為主的討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04（2016年9月），頁103-148。

<sup>39</sup> 李匡悌，〈成本與抉擇：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聚落生活的經濟學觀察〉，收於洪麗完編，《考古、歷史與原住民：臺灣族群關係研究新視野》（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16），頁139-163。

顏廷仔所著〈西寮遺址史前狩獵活動與鹿皮交易的文化變遷〉，以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從西寮遺址的出土資料中，說明西寮遺址的狩獵生業與鹿皮交易，及其產生的活動現象，並闡述其商品化出現的意義。<sup>40</sup>

## （九）對外關係史

臺灣經濟史研究涵蓋的範圍，除了針對島內的經濟進行理解外，還要針對不同時期的對外關係進行研究，才有助於把握島嶼經濟型態的特質。

李佩蓁的博士論文〈條約制度與地方社會：十九世紀臺灣的華洋互動、地方治理和官商關係〉，有別於過去研究是以由上而下的外交談判，和貿易量變化說明臺灣開港通商後的社會經濟，改採由下而上地關注基層社會的人群互動，說明紳商如何肆應條約制度帶來的影響。作者詳細地以樟腦、米穀貿易及徵收釐金問題為例，說明地方官員、紳商、走私洋商間的活動，如何受到開港之前與之後因制度與條約的變化而改變。作者指出開港後條約制度的確立，地方紳商運用與洋商的合作關係，以「洋行」的名義援引英國領事和海關稅務司的權威作為保護傘，反而能一面擺脫地方官員加諸之負擔，一面又在「洋務運動」的政策下獲得新的商務機會。<sup>41</sup>

林逸帆所著〈十七世紀臺灣北部進出貨品研究〉，透過《熱蘭遮城日記》檔案整理淡水和雞籠的商品流通，以臺灣北部貨品的島內流通與對外貿易的數量與種類進行考察，闡述商品交易是由不同族群的活動發展與社會生活為基礎。從中論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貿易的內外連結，還能看出北部原住民與漢人扮演的重要性，並對北部漢人社會發展進行初步考察。<sup>42</sup>

李建緯所著〈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針對臺中市萬和宮內兩座於道光及昭和年間鑄造的金屬鐘進行考察，並與臺灣各地金屬鐘的製造來源進行比照。當時臺灣鑄造業尚未發達，故金屬鐘分別由福州與京都

<sup>40</sup> 顏廷仔，〈西寮遺址史前狩獵活動與鹿皮交易的文化變遷〉，收於林玉茹、植野弘子、陳恒安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V：社會與生活》，頁 115-135。

<sup>41</sup> 李佩蓁，〈條約制度與地方社會：十九世紀臺灣的華洋互動、地方治理和官商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7）。

<sup>42</sup> 林逸帆，〈十七世紀臺灣北部進出貨品研究〉，收於薛化元、川島真、洪郁如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與東亞近代史研究論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6），頁 281-324。

引進，該文並針對其生產者的背景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福州製造者生產的金屬鐘銷售至臺灣各地與東南亞，日治中期後臺灣的金屬鐘則由日本國內供應，反映出臺灣大型金屬佛器的供應來源轉變。<sup>43</sup>

林玉茹所著〈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和寧波郊商人的訊息傳遞〉，運用十九世紀的私文書，釐清條約港與非條約港郊商通訊方式的差異，探索其如何先以中式帆船傳遞書信、貨單、帳簿，在輪船興起後運用輪船信局運送，進而演化至使用電報。該文顯示，在鹿港的郊商仍以中式帆船傳輸，在條約港的郊商則是帆船、輪船、電報三者並用，聯繫方式呈現出多元性的存在。<sup>44</sup>

李文環所著〈日治時期安平港對外貿易之分析〉，透過《臺灣外國貿易年表》與《臺灣貿易年表》的整理，重新考察日治時期安平港的對外貿易。結果發現，日治時期安平港的整體貿易是成長的，有別於以往學界所言的衰退現象，但1906年以後該港呈現進口成長、出口衰退的現象，成為典型的進口港。其中，出口衰退的現象歸因於米糖出口的減少，進口成長可歸因於飲食品、紡織品、紙和木材的成長。就貿易對象而論，1903-1905年間安平港主要的貿易對象已經轉向日本。<sup>45</sup>

近年來對臺灣籍民的研究，開始拓展到經濟部門的研究，說明臺灣商人如何運用國籍上的地位，確保自己事業經營的有利之途。謝濬澤所著〈二十世紀初臺灣與福建商人間的國籍選擇與商業糾紛：以林謀昌案為中心〉，透過1906年臺灣籍民林謀昌在廈門，因與法國籍商號出現商業糾紛，說明遊走於東亞間的商人，如何靈活運用變更國籍與身分的方法，謀求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sup>46</sup> 曾齡儀所著〈亦敵亦友：二十世紀初期汕頭臺灣商人與日本殖民者、潮汕商人的合作和競爭〉，則是考察二十世紀初期臺灣商人在汕頭的事業，並以大東製冰公司為例，說明臺灣人和華人股東如何運用國籍、族群、語言等策略，確保自身利益。<sup>47</sup>

<sup>43</sup> 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文化資產保存學刊》（臺中）35（2016年3月），頁29-66。

<sup>44</sup> 林玉茹，〈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和寧波郊商人的訊息傳遞〉，《臺大歷史學報》（臺北）58（2016年12月），頁157-193。

<sup>45</sup> 李文環，〈日治時期安平港對外貿易之分析〉，《成大歷史學報》（臺南）52（2017年6月），頁1-45。

<sup>46</sup> 謝濬澤，〈二十世紀初臺灣與福建商人間的國籍選擇與商業糾紛：以林謀昌案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4:2（2017年6月），頁83-114。

<sup>47</sup> 曾齡儀，〈亦敵亦友：二十世紀初期汕頭臺灣商人與日本殖民者、潮汕商人的合作和競爭〉，《臺灣史研究》24:4，頁77-112。

洪紹洋所著〈1950年代臺、日經濟關係的重啟與調整〉，說明1950年臺日之間的經貿關係重啟，初期來臺的日資具有戰前人脈的延續關係，之後則為經濟利益為考量的外來投資。此外，還論述日資來臺係著眼於商業與工業的市場利益，並試圖將較為成熟的技術移轉來臺，與日資在東南亞諸國以戰後賠償的經濟協助，由政府領導企業進入當地參與公共工程的投資方式有所差異。<sup>48</sup>

## （十）經濟發展之研究

作為經濟史研究者，若要以一手史料的耙梳為基礎，提出宏觀的構構性問題，需要相當多的研究積累。然而，因不同學科的訓練背景，社會科學各個學門從事歷史性議題考察時，問題意識未必與歷史學者相一致。此外，目前的臺灣史研究中關注的現代問題者以政治議題之研究居多，故對於臺灣經濟體系如何走向現代化的考察，幾乎沒有歷史學者進行討論。

瞿宛文所著《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從後進國家的發展出發，強調政府的發展意志與產業政策，促使戰後臺灣經濟走向發展。作者認為，主流的自由市場理論難以說明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面臨之問題，應由結構學派的觀點論證國民政府在客觀條件的配合下，採取符合時宜的政策。本書中強調「發展動力」層面，認為百年來救亡圖存追求現代化的民族動力，高度提升早期政府經濟與產業政策的品質。<sup>49</sup>

巫永平所著《誰創造的經濟奇跡？》，嘗試解釋戰後臺灣中小企業的成功因素。作者認為政府行為和政府與民營業者的互動形成一種特殊的產業結構，有助於中小企業發展出一種模式，克服資金短缺等不利條件，協助其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出口部門。作者還認為，政府在臺灣產業結構形成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有時是政治策略中的意外產物。這本書在結論，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就臺灣經驗進行討論，認為市場是政府行為、以及政府與市場力量間互動所構成的產物，否定新古典理論之論點。<sup>50</sup>

<sup>48</sup> 洪紹洋，〈1950年代臺、日經濟關係的重啟與調整〉，《臺灣史研究》23:2，頁165-210。

<sup>49</sup> 瞿宛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sup>50</sup> 巫永平，《誰創造的經濟奇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李宗榮、林宗弘所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是由社會學者所發起，邀集多位學者對過去二十餘年臺灣經濟變遷，分別以微觀和宏觀的層次進行考察。有別以往討論戰後臺灣經濟時多從經濟奇蹟或亞洲四小龍等經濟成就出發，這本論著則是關注臺灣從經濟奇蹟到經濟衰退的歷程，以及對個體產業與中產階級所帶來之影響。並考察臺灣經濟面臨全球性經濟衝擊下出現的經濟衰退與社會分化，本地產業如何以「產業升級創新」與「產業外移」兩條路線作為因應。<sup>51</sup>

總的來說，2016-2017年經濟史的研究成果，能夠看到以農林漁牧為主題所撰寫的博士論文數量較之前來的多。近年來農業史的研究方式，開始納入生態環境、社會、技術、飲食等要素進行考察，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出研究成果。至於地域經濟史著作數量較高，與學位論文撰寫或期刊論文撰寫時，具有地緣關係的優勢密切關聯。就對外關係史的研究成果，或能顯現出不同時期臺灣在東亞史脈絡下的位置，使學界對臺灣與周邊地域的經濟關係更為瞭解。另外，在這兩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中，多數論著是以第一手史料進行撰寫，但也有論文是援引二手資料撰寫而成。

透過這兩年研究成果的回顧，自下節起筆者希望藉由本身的研究經驗，以較為宏觀的角度從史料、方法和視角等面向，提出臺灣經濟史研究存在的爭論，以及資料運用上的問題。

### 三、經濟史研究者的自我檢討： 歷史認識、資料認識與新視點

#### (一) 研究積累與歷史認識

關於戰後臺灣經濟史研究，早期常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依據日治時期的資料整理、翻譯和編輯的文獻為研究成果，並在1954-1974年共出版11集《臺灣經

---

<sup>51</sup> 李宗榮、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7）。



濟史》。旅日學者涂照彥與劉進慶，於 1965 年出版《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湾》和《戰後台湾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兩冊學術專門書，成為學界瞭解日治到戰後臺灣經濟史的兩本必讀書籍。<sup>52</sup> 進入 1990 年代以後，由於第一手資料的開放，提供研究者能夠參照檔案文書進行經濟史研究，促使經濟史研究者日漸增加，並對日治時期臺灣人與日本人資本積累、商貿網絡、家族經營、電力事業、水利發展與農會營運等議題進行開展，研究逐漸邁向細緻化。這段時期，對於戰後的經濟史研究，也出現以臺南幫為中心，參照口述訪談所建構成的企業集團發展史研究。<sup>53</sup>

然而，我們對於臺灣經濟史的學術積累，仍有許多時代性的大小議題有待解決。例如就跨期的討論中，既往對於日治時期近代化認識的討論，常直接從日治時期作為嶄新的開始，對於清代跨越到日治時期的認識仍相當有限。至於從日治到戰後初期的認識，近年來的實證研究成果則相對豐富。

就研究論述層面而論，在提出大論點、大問題的同時，仍須對各個面向採以嚴謹的實證研究作為瞭解的基礎，才能更具說服力。倘若學界中已有充足的研究積累，即能運用既有的成果進行論證。但對臺灣經濟史的認識，較難於短期內獲得進展。從日本經濟史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來看，或許因歷經數個學術世代的研究積累與研究者較多的原因，能夠有豐富的實證成果作為大論點提出之基礎。例如石井寬治的《帝國主義日本の對外戰略》，即是運用日本歷史學和經濟史學界既有成果，以馬克思經濟學的觀點，就中日戰爭以前日本經濟的對外擴張，梳理出滿洲鐵路和在華紡織兩個路線。<sup>54</sup> 近期日本學界亦有岡崎哲二、中林真幸等學者採以計量史學的方式進行研究。這兩位學者過去是接受日本經濟史和日本史的訓練為起點，爾後嘗試以計量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出發，為日本經濟史提出新的解釋。例如中林真幸所撰寫的《近代資本主義の組織：製糸業の発展における取引の統治と生産の構造》，是以計量經濟為研究方法進行分析。這些學者透過

---

<sup>52</sup>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劉進慶，《戰後台湾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

<sup>53</sup> 謝國興，《臺南幫：一個臺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sup>54</sup> 石井寬治，《帝國主義日本の對外戰略》（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

新的工具與統計資料的重新整理，對舊有的研究議題以新的方法分析，<sup>55</sup> 其具備較強解釋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既有問題已有許多採取第一手資料的文獻整理成果。如此一來，對於歷史問題的理解，不再是以統計上的顯著與否和經濟學的常識進行說明，或能提升對於歷史問題認識的深度。

在經濟史學術社群的建立上，近年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為中心，可視為投入整合研究的一個好開始。此外，2016年張怡敏與李為楨等學者，也曾針對臺灣銀行的歷史提出整合性科技部計畫，分別從海外事業的人事布局與業務層面進行討論。日本經濟史學界的發展經驗，鼓勵以組織研究團隊的方式進行，故能針對一特定主題展開多個層面的研究。另外，還以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研究集會的方式進行討論，俟有一定成果後於學會報告或申請出版獎助。日本經濟史學界透過這樣的方式，對同時期的各個面向進行研究，因而能對每一階段提出新的特徵與論點。

具體來看，如東京大學出版會曾出版《1920年代の日本資本主義》<sup>56</sup> 與《1930年代の日本經濟》，<sup>57</sup> 即是透過召開研究會的方式得到新成果。大石嘉一郎組織的研究會《日本帝國主義史1、2、3》共三卷，針對第一次大戰期、世界大恐慌期、第二次大戰期進行兼具實證和理論的研究。<sup>58</sup> 2000年代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等編輯6冊的《日本經濟史》，針對幕府末年到戰後高度成長期進行討論，並說明研究方法與資料問題。<sup>59</sup> 近期原朗和武田晴人則各自組織研究會，針對日本從戰時到戰後各個階段，以多個產業和經濟部門為中心，針對各個時點進行有

<sup>55</sup> 中林真幸，《近代資本主義の組織：製糸業の發展における取引の統治と生産の構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3）。

<sup>56</sup> 1920年代史研究会編，《1920年代の日本資本主義》（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sup>57</sup> 社會經濟史學會編，《1930年代の日本經濟：その史的分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

<sup>58</sup> 大石嘉一郎編，《日本帝國主義史1：第一次大戰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大石嘉一郎編，《日本帝國主義史2：世界大恐慌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大石嘉一郎編，《日本帝國主義史3：第二次大戰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sup>59</sup> 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1：幕末維新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2：產業革命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3：兩大戰間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4：戰時・戰後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5：高度成長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6：日本經濟史研究入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

組織的討論。在數量經濟史的研究上，1980 年代末期起岩波書店陸續出版的 8 冊《日本經濟史》，則針對日本長期經濟發展的歷史，從統計分析的層面進行討論。<sup>60</sup>

至於在戰後史的爭論上，瞿宛文與薛化元兩位教授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呈現不同的解釋，即為歷史認識存在的角度問題；稍詳言之，不論是戰前、戰後臺灣史的角度，能夠從上而下的觀察，也能從下而上的觀察。從政府的視線出發，或是從基層資本家或企業的視線出發，顯現出來的問題可能也有所不同。目前的研究有的偏重於上層國家機器的討論，或是多關照下層的人民和企業單位，較難針對一個特定議題，如產業或政策等由上而下的針對各個部門檢討。

從近現代臺灣史的縱深來看戰後臺灣經濟史，1945 年和 1949 年可說是兩個重要的時點。1945 年面對殖民統治後連續與斷裂的問題，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出現。1949 年底政府撤臺，促使臺灣經濟成為獨立的經濟個體；關於這段時期的轉變，可從臺灣史的縱深與中國近代史的延長兩個角度進行考察。臺灣史縱深所注目的議題，聚焦在本地民間資本的累積型態，還有土地改革對地主、資本家與農民的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角度，則聚焦在延長的觀點，耙梳大陸系官僚與資本家來臺後的經濟活動，或集中在政府賢明政策的推行。近期開始有同時關注臺灣本地與來自中國大陸兩方資本家的活動，提出合軌之觀點。<sup>61</sup> 迄今為止，不論是從哪個角度出發進行的經濟史研究，成果仍相當有限，尚不足以運用研究成果提出一個整體樣貌的認識。在從事經濟史研究的當下，我們應思考是否能夠以嚴謹的實證成果超越既有的認識，提出與以往歷史教科書不同的論點，可說是相當大的挑戰。

<sup>60</sup> 速水融、宮本又郎編集，《日本經濟史 1：経済社会の成立・17-18 世紀》（東京：岩波書店，1988）；新保博、斎藤修編集，《日本經濟史 2：近代成長の胎動》（東京：岩波書店，1989）；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集，《日本經濟史 3：開港と維新》（東京：岩波書店，1989）；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編集，《日本經濟史 4：産業化の時代・上》（東京：岩波書店，1990）；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編集，《日本經濟史 5：産業化の時代・下》（東京：岩波書店，1990）；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編集，《日本經濟史 6：二重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89）；中村隆英編集，《日本經濟史 7：「計画化」と「民主化」》（東京：岩波書店，1989）；安場保吉、猪木武徳編集，《日本經濟史 8：高度成長》（東京：岩波書店，1989）。

<sup>61</sup> 謝國興，〈雙元繼承與合軌：從產業經營看一九三〇～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經濟〉，收於財團法人臺灣研究基金會策劃，《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新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頁 343-377。

## (二) 經濟史的資料認識

近年來伴隨檔案數位化與歷史統計資料庫的完善，使得社會科學出身參與歷史研究的研究者日漸增多。究竟透過早期的資料是否能夠寫出歷史研究之論文，或僅能稱為具有強烈歷史感、但可能欠缺嚴謹的史料耙梳與考證？這部分除了問題意識的把握外，有時或取決於資料的認識與運用。

檔案數位化與資料庫的建立，使得讀者能夠在電腦前輕易搜尋所能獲得的資料，免去以往冗長的資料閱讀與整理過程。臺灣史在進行數位化的過程中，或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數位化檔案，在條目和資料庫上最為完善。使用者若能克服語言與文字閱讀障礙，就能輕易找到與研究議題相關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漢珍公司的《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人物誌兩資料庫，亦為資料庫製作的經典，提供研究者輕易查詢欲瞭解的事件與人物。在這樣的前提下，或許開啟了一扇社會科學研究者進行歷史相關課題研究的便利之門。

然而，有些數位化檔案因資料龐大，以關鍵字未必能尋得所需資料。過去筆者開始使用數位化資料時，有時會疑惑是否為「沒有資料」？但經過會議紀錄的逐一閱讀後，始瞭解拜數位科技之賜的數位化整理，仍無法將所有要素逐一納入。近來有時社會科學研究同好在詢問資料時，不時出現以資料庫下關鍵字「找不到資料」的說詞回應。此部分的障礙，或源自於非歷史科班研究者，有時對檔案資料群所屬的位置不清，常抱著「見獵心喜」的心態抓取所需資料進行解讀和引用。此外，部分第一手史料在文字辨識上具有高度困難，若不謹慎的耙梳與解讀，將會陷入分析不夠周延甚至自我矛盾的窘境。

在學術研究中，第一手和二手資料都有其重要之處與價值。或許透過二手資料的整理能撰寫出具有歷史感的論文，但經由第一手資料的耙梳，或以新史料進行解讀或能提出與過去既有認識不同的新論點。如此一來，還可提供以二手研究為主要資料的研究者作為研究素材使用。

在統計資料的整理上，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吳聰敏、葉淑貞、古慧雯教授的《日本時代臺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是對殖民地時期統計資料的基礎認識。<sup>62</sup>

---

<sup>62</sup> 吳聰敏、葉淑貞、古慧雯，《日本時代臺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臺北：吳聰敏、葉淑貞、古慧雯，2004）。

林佩欣在博士論文〈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查事業之研究〉中，也對殖民地時期臺灣統計事業的調查詳加考察；<sup>63</sup> 同樣由其所撰寫的論文〈他山之石：國民政府在臺灣的業務統計體系接收與重建（1945-1949）〉，<sup>64</sup> 則就轉換期臺灣的統計機構的銜接進行討論。

運用新經濟史的研究方法歷史統計資料是不可或缺的，在處理歷史資料時需要經由重新整理，或對欠缺重要部分指標進行推估，其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所謂新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在葉淑貞《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專著中的第二章已針對新經濟史研究的優點進行說明。<sup>65</sup> 但在運用各類歷史統計資料前，對產生統計數據過程中最重要的普查、抽查制度的實施，乃至抽樣方法的精確度，迄今為止似乎還無法對戰前、戰後的實施與修正過程加以釐清。這個問題若能解明，將有助於採取統計數據進行研究的研究者理解各階段統計資料的精確性。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不時以歷史現象作為理論的驗證或修正。但作為社會科學參與歷史研究的過程，須時常警惕自己是否會落入理論先行，並擷取適合的資料作為佐證的迷思。尤其在數位化資料盛行的當代，加速了社會科學者參與歷史研究的捷徑，但社會科學研究者能否進行資料的調查與解讀，則取決於個人之基礎學識。究竟要如何達到實證和理論兩造予以統合，或為社會科學參與歷史研究的最大挑戰之一。

總的來說，十餘年前臺灣學界開始倡議的跨領域研究，鼓勵各個學科進行對話與交流。但在交流的過程中，該如何透過不同領域的相互學習，促使整體學術成果能夠提升，並能接受不同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結論；而非研究者憑藉本身學科訓練的本位主義出發，彼此在相似的研究主題呈現無法溝通的困境。

## 四、代結論：回顧與展望

在論文寫作時，究竟要以較小的事例作為研究主題？還是要撰寫大面向議題

<sup>63</sup> 林佩欣，〈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查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

<sup>64</sup> 林佩欣，〈他山之石：國民政府在臺灣的業務統計體系接收與重建（1945-1949）〉，《興大歷史學報》（臺中）31（2016年12月），頁93-122。

<sup>65</sup> 葉淑貞，《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25-84。

的研究？回顧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仍有許多史實尚待建立，故不論命題的大小，均有助於研究的積累。在早期公開資料較少的階段，固然受限於資料，多撰寫議題較大的論文。但之後伴隨新資料的開放與數位化的盛行，或有必要對產業史和部門史進行更為細緻的研究為基礎，才有助於提出宏觀的新見解。至於在數量經濟史的方法上，除了對總體的經濟指標進行趨勢變化的瞭解外，或許尚可進一步對產業部門進行瞭解，使其在經濟解釋的論述更加深入。

在臺灣史、乃至歷史學研究社群中，願意進行經濟史的研究算是少數。經濟史經常在歷史學研究者視為是進入門檻較高的子領域。究竟我們在進行臺灣經濟史研究前，須要哪些基本知識？我們經由回顧這幾年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論著，又能提供怎樣的展望？

首先，對於經濟史研究基礎知識的培養，不論是農業、工業、企業和貨幣史研究的小範疇，有須要透過瞭解其他學門的分析方法，並運用本身所學之專業，以深化研究議題的分析。例如以研究海外華人經濟史為專門的許紫芬教授，在博士論文階段為分析泰益號帳冊，曾就會計學門中的會計史進行研修。<sup>66</sup> 另外，在進行學際交流時，須要理解各個學門方法的特殊與限制性。例如當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主的經濟學教科書，理論設定提供諸多的假設條件，並規範出外生變數的設定，才決定模型內欲探討的問題變數。但在重重假設下，有些經濟史議題未必適合研究者所屬的核心學門訓練，難以得到良好的研究成果。例如就筆者的研究經驗來看，臺灣在1940-1950年間歷經戰時經濟、戰後接收和政府撤臺等階段，要先掌握整體經濟構造的變化，且精確的考證統計數據的生成過程，誠屬不易。針對這段紊亂的經濟過程，若要強行以新制度經濟學的計量史學進行分析，可能有困難。除此之外，經濟史中的事件，有時會出現無法顧及嚴謹經濟模型的要因，也是必須留意的一個問題。基於以上的認知，在進行特定時期的經濟史研究，似應先以事例和部門研究出發，俟未來研究案例累積充足後，再行提出大的論點。

而以政治經濟學出發的經濟史分析，對於戰後的歷史認識常強調政治與政黨對經濟的影響。但在對這類時代性議題進行檢討時，或有必要先以冷澈的觀點針

---

<sup>66</sup> 許紫芬，《近代中國商人的經營與帳簿：長崎華商經營史的研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對各個部門進行學術性的基礎研究，再進一步釐清當時政治與黨國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避免落入政治先行的經濟解釋。

其次，理解近現代臺灣經濟可從內部構造與對外關係兩個層面出發。在內部構造上，跨越政權所存在的連續與斷裂關係，有賴於大量的事例研究。從近兩年財政與土地歷史研究成果中，使學界能夠對從清朝跨越到日治的來臺過程更為清晰。在對外關係上，除了對島內曾發生的事物予以掌握外，還要對周邊日本、中國和東南亞等環中國海地域的發展過程進行多層次的理解。畢竟，臺灣經濟在1949年以後才成為獨立經濟個體，在此之前的經濟運行均依附於日本或中國等大型經濟體中。經由對周邊地域經濟構造的認識，未來在對臺灣經濟史進行研究時，更能釐清一些現象是否為在地性，抑或地域普遍性之情形。

在臺灣經濟史研究中，對於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戰後研究則相對較少。實際上，我們能夠透過戰前其他子領域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延伸至經濟史所關心的範疇。例如過去二十餘年間在社會史的研究中，對於各地的地方菁英與領導階層已有相當豐富的案例研究；<sup>67</sup> 我們或許可以這些既有的認識為基礎，進一步討論這些人士在土地經營與參與組合團體等經濟層面的資本積累情形，重新理解臺灣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散居各地的中小資本，在各個時期所扮演之角色。但此一萌芽性研究的最大挑戰，在於能否掌握地方史料，未必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所具備之能力，反倒是歷史學者具備基礎工作之優勢。

臺灣史是否能夠從過去的領導菁英層的研究為起點，逐漸邁向對各地域經濟和資本積累的認識？在地方資料瑣碎之下，雖有諸多報紙和人物資料庫，還有工商名錄可提供調查。近年來講求「大數據」分析的概念，但地域史的經濟研究常因資料片斷或不全，深入的研究必須仰賴長期耕耘，或是仰賴取得整批資料的機運。然而，若能對戰前和戰後臺灣長期整體性的工商資料進行量化、質化且有系統的整理，並運用 GIS 工具進行展現，或許能以「大樣本」的形式，重新勾勒出近現代臺灣資本積累的演進與轉型。

臺灣經濟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過程中，歷史學者是否該更應積極從事現代史的研究與討論？在臺灣史中的政治史研究者，可說最為熱絡參與現代史議題，關注

---

<sup>67</sup>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等議題，並指導諸多研究生投入這方面之研究。經由本次的回顧，我們看到關於 1990 年代以後至當前經濟問題的討論，多為社會學者所進行。臺灣的經濟學界或因侷限於以臺灣實證進行的研究，較不易投稿至國際優秀期刊，使得這段時期的研究成為社會學者的戰場。然而，這類研究因僅關注現代經濟問題，故未對臺灣經濟如何從 1970-1990 年代轉變至迄今進行討論。在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中，目前較為嚴謹的戰後經濟史研究多至 1960 年代為止。對於 1970 年代以後臺灣經濟的理解，僅能仰賴時論、官僚回憶錄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從臺灣史的縱深來看，過去對於日本治臺的 50 年已有豐碩的成果，但戰後從 1945 年迄今已歷經七十餘年，作為歷史學者該如何面對近現代臺灣經濟史，處理從近代移行至當代的過程，或許是可以期待的一個方向。



## 引用書目

1920 年代史研究会（編）

1983 《1920 年代の日本資本主義》。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大石嘉一郎（編）

1985 《日本帝国主義史 1：第一次大戦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8 《日本帝国主義史 2：世界大恐慌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4 《日本帝国主義史 3：第二次大戦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中村隆英（編集）

1989 《日本經濟史 7：「計画化」と「民主化」》。東京：岩波書店。

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編集）

1989 《日本經濟史 6：二重構造》。東京：岩波書店。

中林真幸

2003 《近代資本主義の組織：製糸業の発展における取引の統治と生産の構造》。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王御風

2016 《波瀾壯闊：臺灣貨櫃運輸史》。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石井寛治

2012 《帝国主義日本の對外戦略》。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石井寛治、原朗、武田晴人（編）

2000 《日本經濟史 1：幕末維新时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0 《日本經濟史 2：産業革命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2 《日本經濟史 3：両大戦間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7 《日本經濟史 4：戦時・戦後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0 《日本經濟史 5：高度成長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0 《日本經濟史 6：日本經濟史研究入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安場保吉、猪木武徳（編集）

1989 《日本經濟史 8：高度成長》。東京：岩波書店。

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編集）

1990 《日本經濟史 4：産業化の時代・上》。東京：岩波書店。

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編集）

1990 《日本經濟史 5：産業化の時代・下》。東京：岩波書店。

何欣潔

2015 〈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從土地所有制度演進重看臺灣戰後初期農村土地改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98: 147-193。

何鳳嬌

2016 〈臺灣實驗經濟農場的成立與裁撤（1947-1951）〉，《臺灣風物》（臺北）66(4): 45-92。

吳文星

2008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吳密察

2017 〈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8-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 10: 5-35。

吳聰敏、葉淑貞、古慧雯

2004 《日本時代臺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臺北：吳聰敏、葉淑貞、古慧雯。

呂紹理

2016 〈從螟蛉到螟害：近代臺灣的農業蟲害及其防治〉，收於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頁 403-462。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巫永平

2017 《谁创造的经济奇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力庸

2016 〈從大圳到水庫：石門水庫興建與土地利用〉，《桃園文獻》(桃園) 1: 79-86。

2017 〈深耕臺灣：2013-2015 年農業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臺北) 36(4): 1-13。

李文良

2016 〈清代南臺灣六堆的米穀生產與流通〉，《臺灣史研究》(臺北) 23(4): 39-80。

李文環

2017 〈日治時期安平港對外貿易之分析〉，《成大歷史學報》(臺南) 52: 1-45。

李匡悌

2016 〈成本與抉擇：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聚落生活的經濟學觀察〉，收於洪麗完編，《考古、歷史與原住民：臺灣族群關係研究新視野》，頁 139-163。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李衣雲

2010 〈日治時期日本百貨公司在臺灣的發展：以出張販賣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 33: 155-200。

李衣雲(著)、齊藤啓介(譯)

2016 〈戰時から戦時まで：国家統制と台湾の「百貨店」、1937-1960〉，收於細川周平、山田獎治、佐野真由子編，《新領域・次世代の日本研究》，頁 87-111。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李佩蓁

2017 〈條約制度與地方社會：十九世紀臺灣的華洋互動、地方治理和官商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李宗榮、林宗弘(主編)

2017 《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李建緯

2016 〈臺中市萬和宮金屬鐘研究：試論其所反映的產銷問題〉，《文化資產保存學刊》(臺中) 35: 29-66。

李為楨

2017 〈日治初期臺灣銀行對地方之經營：以鼎新公司為例〉，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07-524。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林文凱

- 2017 〈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臺灣史研究》（臺北）24(4): 35-76。
- 2017 〈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南投）68(4): 117-146。

林玉茹

- 2009 〈2007 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臺北）28(4): 19-31。
- 2016 〈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和寧波郊商人的訊息傳遞〉，《臺大歷史學報》（臺北）58: 157-193。

林佩欣

- 2011 〈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查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2016 〈他山之石：國民政府在臺灣的業務統計體系接收與重建（1945-1949）〉，《興大歷史學報》（臺中）31: 93-122。

林逸帆

- 2016 〈十七世紀臺灣北部進出貨品研究〉，收於薛化元、川島真、洪郁如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與東亞近代史研究論集》，頁 281-32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社會經濟史学会（編）

- 1982 《1930 年代の日本經濟：その史的分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涂照彦

- 1975 《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洪紹洋

- 2016 〈1950 年代臺、日經濟關係的重啟與調整〉，《臺灣史研究》（臺北）23(2): 165-210。
- 2016 〈臺灣工礦公司之民營化：以分廠出售為主的討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104: 103-148。

徐世榮、蕭新煌

- 2001 〈臺灣土地改革再審視：一個「內因說」的嘗試〉，《臺灣史研究》（臺北）8(1): 89-124。

高淑媛

- 2016 〈線香與生活：臺灣傳統線香業及其技術的演變〉，收於林玉茹、植野弘子、陳恒安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V：社會與生活》，頁 165-180。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張安琪

- 2017 〈臺灣寺廟土地財產的近代化（1895-191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孟秋

- 2017 〈戰後臺灣中部地區的農業發展（1950-2010）〉。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張怡敏

- 2016 〈臺灣貯蓄銀行之設立及其發展（1899-1912 年）：兼論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臺灣史研究》（臺北）23(1): 39-74。
- 2017 〈臺灣銀行股東構成之特徵與其意義（1899-1919）〉，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83-505。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張家綸

- 2017 〈植樹之道：日治時期臺灣樟樹造林事業及其學術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集）

1989 《日本經濟史3：開港と維新》。東京：岩波書店。

莊建華

2016 〈回首來時路：桃園國際機場的規劃與興建（1969-1979）〉，《桃園文獻》（桃園）1：99-107。

莊勝全

2017 〈《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莊濠賓

2016 〈萬里雲羅：桃園紡織一甲子〉，《桃園文獻》（桃園）1：87-98。

2018 〈世變下臺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許紫芬

2015 《近代中國商人的經營與帳簿：長崎華商經營史的研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水融、宮本又郎（編集）

1988 《日本經濟史1：經濟社會の成立・17-18世紀》。東京：岩波書店。

連克

2017 《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營（1862-194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

陳兆勇

2011 〈土地改革與政權鞏固：戰後臺灣土地政策變革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陳家豪

2017 〈從產業合理化與交通統制看臺人資本存續：以汽車運輸業為中心（1929-1945）〉，《臺灣史研究》（臺北）24(1)：77-124。

陳祥雲

2016 〈劉航琛與利濟實業公司的經營（1946-1956）〉，《國史館館刊》（臺北）49：33-64。

陳穎禎、青井哲人

2016 〈清末から日本植民地時期までの台湾阿里山地域における蕃産品交易所に関する研究：交換事業者劉闊の活動を中心に〉，《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東京）81(722)：1059-1067。

曾齡儀

2017 〈亦敵亦友：二十世紀初期汕頭臺灣商人與日本殖民者、潮汕商人的合作和競爭〉，《臺灣史研究》（臺北）24(4)：77-112。

黃仁姿

2016 〈戰時戰後的臺灣農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黃富三

2016 〈林朝棟與清季臺灣樟腦業之復興〉，《臺灣史研究》（臺北）23(2)：1-64。

新保博、齋藤修（編集）

1989 《日本經濟史2：近代成長の胎動》。東京：岩波書店。

葉淑貞

2014 《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廖彥豪、瞿宛文

2015 〈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歷史過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98: 69-145。

臺灣銀行（編）

2016 《臺灣銀行七十年》。臺北：臺灣銀行。

劉志偉、柯志明

2002 〈戰後糧政體制的建立與土地制度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臺灣史研究》（臺北）9(1): 107-180。

劉進慶

1975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蔡承豪

2016 〈品種轉換、加工換轉：臺南的蕃茄產業（17世紀-1945年）〉，收於林玉茹、植野弘子、陳恒安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V：社會與生活》，頁 137-163。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蔡昇璋

2017 〈興策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薛化元

2016 〈國民黨經濟政策與臺灣經濟發展的再思考：從土地改革講起〉，《臺灣風物》（臺北）66(1): 73-101。

謝國興

1999 《臺南幫：一個臺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7 〈雙元繼承與合軌：從產業經營看一九三〇~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經濟〉，收於財團法人臺灣研究基金會策劃，《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 343-377。新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謝濬澤

2017 〈二十世紀初臺灣與福建商人間的國籍選擇與商業糾紛：以林謀昌案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北）24(2): 83-114。

瞿宛文

2015 〈臺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98: 11-67。

2017 《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顏廷仔

2016 〈西寮遺址史前狩獵活動與鹿皮交易的文化變遷〉，收於林玉茹、植野弘子、陳恒安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V：社會與生活》，頁 115-135。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釋明瑛

2016 〈被遺忘的豪商郭春秧：以日治時期活動為主題〉，《臺灣學研究》（新北）20: 31-68。

##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in Taiwan (2016-2017):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ao-yang Hong

###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of topics discussed, this study performed a simple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on economic history in Taiwan published between 2016 and 2017, highlighting several studies of significance. Moreover, suggestions for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in Taiwan were proposed us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Japanese economic history accumulated over an extensive period as an example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Marxian economics and cliometrics. In addi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topics on post-war economic history were pointed out and fundamental historical knowledge required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se topics were identified. Finally, blind spots in using digital archives, databases and statistics were explored along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s applicable to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se methods.

**Keywords:**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